

我在古脊椎所的早期岁月

周忠和

我是 1986 年考上了苏德造老师的硕士研究生而进了古脊椎所的，距今整整 23 年了；1989 年毕业后便留了下来。转瞬间，曾经的年轻学子现已步入中年的行列。在这期间，除了 4 年在海外的短暂学习外，其余的时间基本上是在研究所按部就班地度过的，也得以亲历并感受了研究所 20 多年来的变化和发展。尽管往事如烟，然而回忆起来 IVPP 早年岁月中的点点滴滴，还是颇有一些感触，值研究所 80 大庆之际，粗略记下一些琐碎，算是立此存照吧。

来研究所之前，就从南京大学的老师们那里听说，“北古所”（因为南京有南古所，所以南京的同行一直习惯这样称呼 IVPP）录取研究生对英语要求很高，班上的不少同学因此望而却步，好在这一点我不太担心，大概是从中学起自己的英文便一直在各门功课中学得最好。来所后，苏老师安排了大量的中生代鱼类的文献阅读，基本上都是英文的。尽管当年下海经商热潮滚滚，社会上还流传“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一类的怨言，然而我也早就明白做科研还是比较适合自己的一条路，因此还能心无旁骛。后来我才认识到，这样的阅读除了增加了对专业知识的了解外，还对提高自己的英文阅读理解能力帮助甚大。所以到后来出国考托福，就没有专门花费太多的功夫便考了高分。苏老师是诚实厚道之人，向来与世无争，做学问也是如此。尽管我后来改了专业，但老师教我的做人做事的原则却一直不敢忘记。

虽然刚进所时，自己的英语基础还不错，但 IVPP 不乏高手。此外，自己

一直感到英文口语较差。大概是高我一级的沈梅、员晓峰的提议，同时期的几个研究生们一起，组织了一个 IVPP 的英语角，实际就是每周有一个晚上聚在一个宿舍，围坐到一起，用英文闲聊，复杂的说不出来，简单的早已说过无数遍，坚持下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于是我还想出了找一个辩论议题的主意，确实活跃了一点气氛，居然还坚持了一年有余。尽管 20 世纪 80 年代的国际交流还比较稀少，但古脊椎所还是偶尔会见到一些外宾。于是找外宾来聊天成了我们能想到的一个办法。记得有一次我找到了一个外宾，请他和我们一帮人晚上在会议室聚一聚，聊聊天，虽然敢开口的人不多，但效果还算不错。没有想到，第二天时任科技处长的郑家坚老师便找到了我，委婉地给予了批评，他说这种事情，你应当事先和科技处说一下，毕竟在当时外事活动大家都十分小心的。

古脊椎所是一个小所，当年研究生很少，因此学生和老师都彼此十分熟悉。导师之外，研究室其他的老师基本上也很少见外的。譬如说，张弥曼老师当年为了我改行研究古鸟类的事，就费了不少的功夫。1992 年我第一次出国参加国际会议的机会，也是她帮助我争取而来的，而且全部费用都是德国的主办方提供的。记得我当时写了一个英文摘要请她帮忙修改，她问我谁帮我改过了，我说没有；过了几天，她又问了我同样的问题，我当时的感觉有点矛盾：一是看来自己写得不错，有点沾沾自喜；二是感到一丝委屈，尚未达到“人不知而不愠”的境界。后来，张老师还希望我加强一下中文，甚至还借给我几本鲁迅的著作让我去读。

其实当时研究室的其他老师对研究生基本上都是一样的，很少因为是自己的学生就加以偏袒。已故的刘宪亭先生在 1965 年最早和周家健老师记述了辽西的北票鲟化石。我后来硕士论文决定做北票鲟的详细研究，很大一部分材料都是刘先生自己多年收藏后交给我研究的。而且，他还介绍了自己的老朋友一

辽宁煤田地质局（阜新）的常征路先生和阜新矿院的蒋福兴老师亲自全程带我去辽宁北票的尖山沟采掘了大量的化石，在当时的条件下是没有野外补助费的，这些热心人的无私帮助让我十分感动。80年代末，研究所没有几台电脑。因此打字机还非常普遍。我清楚地记得，我当时晚上就利用刘先生办公室的一台英文打字机练习规范的打字手法，整整坚持了一个月，受益终身，深感磨刀不误砍柴工。做硕士论文的时候碰到几篇关键的俄文文献，让我一筹莫展。于是我大胆请教了图书馆的史庆礼老师帮忙，结果他短短几天就帮忙翻译了好几页的资料，让我如释重负，顺利完成了论文，也再次感受到了研究所老师们对青年人的厚爱之情。

我刚来研究所的时候，就听研究室其他老师讲，苏老师管学生很严，周末从家里都要张望一下办公室，看看陆一（师兄）在不在办公室。大概看到我还比较自觉吧，苏老师其实一直给了我一个比较宽松的环境。陆一师兄号称“大侠”，博闻健谈，做事不拘一格，与我等木讷愚钝成鲜明对照。记得那次，他陪我去陕北采集鱼化石，下午6点的火车，他要到4点多才收拾行李，5点才从所里出发，结果到了火车站，一路狂跑，才勉强赶上了火车，着实让我惊出一身冷汗。其实，到了野外才发现，大侠自有侠骨柔情。不止一次，一天野外结束，当我还在河沟里游泳的时候，他已经连我的衣服一并洗干净了，这让我既感动又羞愧。

八九十年代的研究所，虽然条件不如今天，但年轻人的体育活动倒是十分活跃。羽毛球一直是主项，当然只能是室外的，经常是要排队才能轮上上场的机会的。有一段时间，排球十分流行，下了班就架网，气氛十分热烈。足球居然也曾风行一时，就在当时的小院子里。高我一级的陈晓峰曾将院内的车玻璃踢坏；吴乐斌也曾一脚将办公楼的大门玻璃敲碎，所幸当时张弥曼所长正好客串守门几分钟，事后也只能不了了之，当时的后勤处长恐怕对我们十分恼火。

还记得邱占祥老师担任所长的时期，研究所正处在最困难的一段日子。不仅面临科研经费改革，而且社会上也很强调科研的应用价值，对基础研究的认识争论比较大。对于我们这样一个研究所来说，各方面的困难可想而知。当时要靠旧办公楼的一些屋子出租才能勉强收支平衡。当时作为研究生的代表之一，曾经请求和邱占祥所长进行了一次改善研究生住宿条件的对话会，焦点是挣钱重要还是吸引青年人才重要，会谈的细节记不清楚了，只知道最后邱所长艰难地说到“好吧，为了吸引人才，研究所十几万不挣了”。这句话一直深深印刻在我的脑海中。

1999 年我从国外获得了博士学位后即刻打算回国，本不符合中科院“百人计划”的某些硬杠杠，所里的老师尽了各种努力，最终得以特批成为了研究所第一位“百人计划”的获得者。回国的那一天，更出乎我意外的是，邱铸鼎所长等人亲自到机场来欢迎我，着实让我诚惶诚恐。如今，万不曾想到的是自己也被历史推到了研究所领导的岗位，虽说和前任朱敏所长相比不算年轻，对研究所的情况也算比较熟悉，但每每想到曾经拥有了杨钟键、裴文中、贾兰坡等一代大师，先后拥有 8 位蜚声海内外的中科院院士，并且在国际古生物学界赫赫有名的 IVPP，如此荣耀和沉甸甸的历史闪过心头，便战战兢兢，不敢有丝毫的懈怠，唯有兢兢业业，看护好这份家业，继承优良的传统，并且有所发展，方能不辱使命。